

MANAGING
TRADE RELATIONS
in the New World Economy
THOMAS ANDERSSON

新世界经济贸易关系的协调

〔瑞典〕 托马斯·安德松 著
李晓宪 译

经济管理出版社

新世界经济贸易 关系的协调

【瑞典】托马斯·安德松著
李晓宪 译

经济管理出版社

责任编辑 卢小生
版式设计 陈 力
责任校对 张晓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世界经济贸易关系的协调/(瑞典)安德松(Andersson, T.)
著;李晓宪译.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8. 1

ISBN 7-80118-550-1

I. 新… II. ①安… ②李… III. 国际经济关系-协调-研究
IV. F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6036 号

新世界经济贸易关系的协调

[瑞典] 托马斯·安德松著

李晓宪 译

出版: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新街口六条红园胡同 8 号 邮编: 100035)

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总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1/32 6 印张 140 千字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ISBN7-80118-550-1/F·527

定价: 12.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邮编: 100836)

前 言

本书在一定程度上以《欧洲和东亚的日程》为依据，那是我与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院长 S·布伦斯坦·林德教授合著的一本书，由欧洲大学研究会出版。

本书虽然涉及的范围很广，但并不对涉及到的每个问题的每个方面都予以研究，也不包括对相关问题其他文献的研究。在新的世界经济中存在一些对贸易关系来说很重要的发展阶段，本书的目的就是提供一部概览，即对这些发展阶段的前景进行分析概括。

感谢“经济和社会研究院工业研究所”的同仁们给我提出的宝贵意见；特别感谢 T·弗里德里克森给予的出色协助；我还要感谢 N·阿维德松和 H·海爾斯特罗姆为本书提供资料。本书得到了瑞典人类与社会科学研究院的资助。

托马斯·安德松

中文版序

人们普遍意识到，世界正处在由军事冲突向经济收益竞争转换的过程中。国家、民族已不再企图相互统治和压迫，人类今天面临着多少世纪以来首次出现的互惠互利地交换货物、服务、投资和技术的大平盛世。

上述看法并不意味着敌对的日子已经结束。整个 20 世纪，欧洲和北美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密切注视着东亚日益增长的竞争，尽管主要表现为对日本的严峻挑战抱有偏激之见。早年西方人对东亚经济发展别有一番忧虑萦绕在心灵深处，总是揣测，有着辉煌历史和文化传统及众多人口的中国若有朝一日大展宏图，会构成更大的威胁。20 世纪 20 年代，我母亲和她 10 岁的同学们在斯德哥尔摩一所小学读书时，老师曾谆谆教诲说，要当中国。

近几年，上述恐惧有增无减。东亚新一代创造的经济奇迹全球传颂，中国更是成绩卓著。西方几乎家喻户晓，雄踞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之首的是中国东南部的一方热土。中国吸引外资企业的能力标志着在世界对外投资总额中第三世界的份额出现颠倒乾坤的大转折。中国不断向新市场和新部门的出口扩张，已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今年香港“回归”更是举世瞩目的大事，都在议论这一前英国殖民地的前景及回到中国怀抱后将发挥的作用。

在一些西方人看来，中国的崛起是祸不是福，纷纷指责中国搞不公平竞争，不尊重专利和商标，压制民主，为了同人口过剩做斗争不惜残杀女婴，不公正地使用廉价劳动力，滥用环境。自不待言，这些观点掺杂着无知的成份。

对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不甚了解，对中国社会各阶层实行全民福利的难度缺乏认识，无视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的差异。

西方流行观点笼统地将整个地区视为由强劲竞争对手构成的一大板块。

站在亚洲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立场上看，同西方的贸易存在着各种危险。以往被视作主要威胁的是军事侵略和跨国企业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而今更为关注的焦点是外在的阻挠后进国家发展经济奋起直追的清规戒律，再就是担心西方社会和文化影响对当地传统价值观的侵蚀。

本世纪，美国比欧洲更倾向于通过政治权势左右发展中国家，西欧各国对东亚事务一般是不闻不问，也因此对东亚情势一知半解。正如本书所讨论的，种种原因表明，欧亚之间交往水平低下是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本书的大前提是，国际贸易并非简单地以物美价廉取胜。有商务实践经验的人都知道，交易各方建立“关系”和信赖，通常是成功的先决条件，是降低信息情报和其他交易成本所必需的。八面玲珑恐怕是中国社会长期鄙薄商人的原因之一。做生意仍然主要靠人际关系，这似乎与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时代相矛盾，信息和通讯技术已使得沟通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成为可能。然而，不亲身接触，不亲临现场，对贸易伙伴特殊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缺乏了解，将构成技术本身无法克服的严重障碍。

欧洲发现自己现在的处境堪忧，经济增长滞缓，结构调整步履维艰，无力开辟新市场，创办新兴产业，增加就业机会。欧洲需要在参与东亚和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脱胎换骨，变得更加开放，更加机动灵活，扩展积蓄的经济实力。反之，中国和东亚可以从与同业竞争者的交往中获益，不仅是经贸往来，而且包括社会和文化交流，更有利于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积极作用。

世界人口不断增长，世界经济日益扩充，带来了一系列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为了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需要建立防范经济压迫或掠夺的基本原则。例如，加强保护弱小或尚处于脆弱的发展

阶段的国家。保护全球环境财富的问题同样摆到世人面前，为了呵护向人类提供生存基础的海洋、大气层和森林，需要建立调控人类对生态环境施加综合压力的机制。一如既往，世界需要确立共同的准则来保证利益冲突不致再次将人类拖回到武力拼杀的老路上去。未来战争的规模很可能是前所未有的。

显然，我们需要相互学习的东西有很多，尤其是要不断发现新事物，研究新问题。例如，90年代中期，拙作初成之际，美国再度发挥其技术优势发展了具有高度伸缩性和竞争性的经济，向世人证明其有能力解决一些老的症结。现在看来，许多国家，包括德国和日本，应在这方面学习美国的经验。另一方面，我们已具备确立和总体把握共同行动纲领的能力，不必非得在借鉴反省上狠下功夫。认清相互利益之所在，彼此尊重，以诚相待，能否在世界范围实现这一目标，东亚和欧洲将起到决定性作用。遗憾的是，迄今我们仍有着太多的隔阂。究其原因，地理距离、历史积怨、技术难关都算不了什么，关键是临界的总体的接触点阙如。

概言之，本书出自一个欧洲人的手笔，力求唤起人们对欧亚的注意，为增进思想交流，同舟共济，为未来的繁荣昌盛奠定基础，而聊尽绵薄之力。切望中国广大读者用自己的方式参与进来弥合两大地区间的沟壑。

在此，我要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朱莉研究员、以及我的朋友、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张钢博士表示感谢。是他们的热情帮助和支持，才使得本书在中国得以顺利出版。

最后，我要补充一句，我于1996年出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科学、技术、工业理事会副理事长。本书撰写于任命之前，书中的观点仅是我个人的，并不一定反映经合组织或其成员国的。

托马斯·安德松

1997年7月9日于巴黎

第一章 新 时 代 的 挑 战

诸多突如其来事件的发展导致了国际关系中力量平衡的改变，并且使得国际事务议事日程的中心议题更迭。其中包括地区或经济体系之间竞争的转换。众所周知，国家计划经济的第二世界已经解体，不复存在了。通过中央指令配置资源已经证明是一种没有前途的过时的管理模式。尚无多少证据表明，第一世界——工业化的市场导向的西方经济——已丧失先前的统治地位。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最终分化重组，显示出不同的经济趋势。

非洲及大多数南亚国家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其突出特征是人口急剧增长，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受到贫困和停滞的制约。人们无论是固守乡村还是迁入城区杂乱的贫民窟，都难以找到出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境遇大体相同，不过，有部分国家正显出令人鼓舞的工业发展势头。

另一方面，东亚地区则以其勃勃生机为特征，取得了传奇般惊人的成就。世界这一地区的主要经济大国日本，不仅转变为主要工业化国家，而且已经成为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的全球强国。尽管遭受 90 年代初期全球经济不振的影响，但是实际上也只不过略现短暂的减退而已。在日本雄居东亚经济之首的同时，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ANIEs，亚洲“四小”）紧随其后。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东盟）各成员国亦取得数十年稳定增长的成就。该地区较为贫穷的国家也显现出经济增长的势头，这其中包括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上亚洲无可争议的经济文化中心的中国。

世界各地急剧的变化产生相互作用。苏联因各种离心力量而解体。这是由于同美国开展军备竞赛所付出的代价而加速了对其政策的重新估价。亚太地区蓬勃发展也起到一定作用，暴露出苏联相形见绌的落后状态。不仅来自西方的威胁，经济迅速发展的东亚削弱了苏联军事安全体系所依存的经济基础的相对优势。

随着冷战结束，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减少了军事抗衡的意义。在南方，经济被剥削国家“集团”这一现象开始淡化。第三世界赖以维系自身的教条日益显得既无的放矢，又不切实际。外国投资者不再遭到仇恨反而受到欢迎，没收外国资产的风潮已彻底平息。向工业化国家出口不再被视为受掠夺的象征，而放弃对工业化国家出口的机会却被认为是不幸。

虽然实行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旨在减少国际危机，但是安全问题并未就此消失。暴力和危险的冲突仍时有发生。然而，军事力量已不再是解决问题优选的有效手段。当然也有一些明显的例外，诸如多国部队对伊拉克肢解科威特所作出的反应。大多数冲突例如，斯里兰卡，巴勒斯坦，前南斯拉夫等，都发端于内部对抗性矛盾，进而经济和社会的紧张状态又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世界共同体无疑仍可在解决冲突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但争取广泛的国际联盟支持现在已经出现多种特殊策略。从长远看，联合国可在这方面发挥适当的作用。

美、苏曾凭借其军事实力充当特殊的角色。如今军备建设已丧失其“优越性”，这不仅是因为现代武器装备代价高昂，而且是因为世界范围内对经济目标的追逐已压倒意识形态之争。俄罗斯联邦及其他前苏联的“继承人”要在财政拮据和市场运作经验有限的情况下废除旧的社会机器，重建新的社会。要消除该地区存在的对自身及他国不确定性威胁，那么可设想的外部干涉便唯有在经济方面给予合作和援助。反观美国，由于无力“处理好家务”和削减赤字，加之别国异军突起形成不可避免的相对衰落，昔

日无可争议的霸权已日渐丧失。

广义地说，国土大小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构成经济增长的有利要素。虽然“广袤”在战略或军事领域或可实现卓有成效的管理，但是，在社会和经济领域却绝非易事。俄罗斯的幅员辽阔并未推动其经济运行；非洲和拉丁美洲资源富足型经济排在最贫困的行列，连美国亦在为经济的长期增长大伤脑筋。当今之世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国家（地区）均都是一些“弹丸之地”。问题不在于自给自足的国内市场，而在于进入国际市场经受竞争压力的考验。效益主要不是来自于国内垄断市场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而是来自于技术、高素质的人力资源、知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一些观察家看到了“新的”潜在冲突的策源地。不幸的是，历史提醒我们，传统的危险仍然存在。柏林和东京的终极愿望尚不明瞭。他们的新的野心是觊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欲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任命的常任理事国平起平坐。由于他们无法将独立的对外政策诉诸武力，德国和日本就集中精力进行经济目标的追逐。经济力量的增强再次成为他们把对外政策扩大到军事领域的手段，只要他们愿意的话。莫非他们已悟透个中三昧，通过贸易和投资实现对外政策目标，远胜于凭借外交加军事实力追逐对外战略的终极目标？

事实上，在国际议事日程的核心议题中，经济问题已取代对军事安全的关注。日本及统一后的德国分别是欧亚这两大地区的中心，自然成为过去十年中人们谈论的热门话题。到处都在议论如何应付来自东亚地区的竞争，对那里出现的机遇该作出何种反应。西方经济正在出现巨额贸易逆差，主要是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其次是对亚洲“四小”和中国的贸易逆差。了解东亚是如何实现经济腾飞的，究竟在什么程度上仿效或学习其经营之道，已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

另一方面，德国则是欧洲共同体（EC，欧共体）以至整个欧

洲的经济重心。长期以来，欧洲一直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诸多小国饱受经济文化分割之苦，各公司规模太小，以致无法形成规模经济效益，而对一国市场而言又太大，导致高度市场集中和垄断行为。可是，在外界压力不断增强的情况下，担任欧共体执委会主席的法国人雅克·德洛尔领导了一场改造运动。通过采用300多项欧洲通用法案，创建“统一大市场”，实现货物、服务、资本和劳务的自由流通的工程计划，于1992年底完成。为一个新的更具潜力的欧洲敞开了大门^①。

统一大市场并非欧洲一体化的终端。欧洲经济区（EEA）将统一大市场与西欧大多数“非成员”国家维系在一起是可能的。考虑到在该框架中缺少对欧共体政策施加影响的手段，瑞典、奥地利、芬兰已申请成为正式成员。欧共体内部的调整过程在更大范围内亦加快进行。统一后的德国实力大增，产生了将自己与更团结更安全的共同体相融合的强烈愿望。国际竞争中风云变幻，动荡不安，同样对欧洲提出政治和货币一体化的要求。

1991年，上述运动迅速转变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开始组建欧洲联盟（EU，欧盟）。此举遭到某些国家和某些国家内部省区的反对。首次公众咨询——在丹麦举行的全民公决——未获得通过。尽管尔后爱尔兰，法国全民公决情况稍好一些，但是，一体化进程的前景已经变得难以预测。欧洲正遭受经济不稳定的冲击，部分原因在于德国统一后面临一个困难和紧张时期。多变的汇率和居高不下的利率已是司空见惯，商业正蒙受损失，本来就很高的失业率仍在不断上升。

当西欧正在考虑怎样再次调整其内部结构之时，东欧的问题又出现了。随着为实现经济开放和改革而进行的社会根本变革，往

^① 90年代伊始，人们对能否开掘出上述潜力尚存诸多疑问。欧洲经济结构重整困难重重，失业率居高不下，排外的社会倾向仍是个严重问题。

日受到压制的不协调的事物和种族冲突层出不穷。作为欧洲最大的资本货物出口国，又因为文化和结构上的纽带联系，德国势必从东欧经济复兴过程中捞到最多的好处。反之，动乱局面持续下去，甚或进一步扩大，损失最大的无疑也将是德国。

在欧洲致力于加固欧洲大厦时，其他地区也纷纷开始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确定从1994年起，计划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实行自由贸易。众多发展中国家亦各自集结，向同一方向发展。东亚地区担心这种区域性构造主要是旨在排斥其出口和投资，亦怀抱诚意磋商在亚太地区建立更为开放的交流与合作。随着这一地区的多种经济日趋增长和成熟，相互间日益和谐共存，上述构想绝非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至此，人们普遍担心世界经济将分化为国家“集团”，各集团内部实行自由化贸易，而各集团之间则推行保护主义政策^①。

瓜分世界市场的危机并非肇始于区域自由化本身，而是来源于多边贸易体系的脆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关贸总协定）确定了世界贸易规则，其基石是多边贸易原则——一国不得对某一贸易伙伴实施不适用于全体贸易伙伴的禁制。几十年来，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贸易和收入稳步增长。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固定汇率被解除，70年代石油危机以及新兴竞争者的崛起，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极不确定与极不稳定的阶段。

与上述发展相平行，企业经营呈现出迅速国际化的特点。先前囿于一国范围的企业扩展为跨国企业，通过所谓对外直接投资控制其在国外市场的分支机构。具有明显不同比较优势的国家之间进行不同类产品交换的传统贸易方式，已让位于生产要素极为

^① 1986年，世界贸易总额中35%是区域内贸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88年）。以区域为基础的优先贸易安排谈判对世界出口贸易的影响已超过普惠制（GSP）。

相似的国家之间、行业内部甚至企业内部的有差别同类产品的交换。这种贸易的主要基础是技术和人的技能，以及内在质量或外观设计方面的专门化。为数不多的大集团公司现今把持着跨越国界的错综复杂的交易网络。一些交易与有形贸易有关，涉及旷日持久的产业结构调整，另一些交易则极为灵活，减少了时间延误。巨额金融交易可在数分钟或数秒钟内完成。

从国家的观点看，国际化进程使企业脱离国家的窠臼，跨国企业的融资和组织能力加上其在技术、生产和贸易中的优势，使之有能力规避各国政府所设的约束。企业雇员及其家人也正变得更具适应性和流动性。许多规则和控制手段正变得越来越难以行得通，而且成本在不断增加，这些规则和控制手段虽未被取消，但却形同虚设。在运用财政和金融政策调控经济运行方面，世界各国政府均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难题。

从跨国企业的角度看，组织实施整体经营活动要通盘考虑各地独特的优势，其关键是要考虑与之相互作用的当地私营或公有企业经营者的行为，以及其与企业需求和能力的关系。基于先进技术的举措尤其要考虑外部投入的情形，诸如完善基础设施、令人满意的劳动力，以及富有发明成果的科研单位等。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都面临战略抉择。哪些技术应加以开发？哪些技术应购入或获取？哪些经营活动应放在哪些市场上？应提高劳动者哪些技能？如何提高？这些环境因素对于国内或国际市场参与者来说产生着强烈影响，加剧了地区之间和经济体系之间的竞争。

变化中的国际环境引出诸多有争议的问题，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争执多年，最终才达成一揽子协议，在大多数议题上各自做出重大让步，并建立了新的世界贸易组织（WTO 世贸组织）。正是因为存在上述种种问题，美国已经调整了其贸易和投资政策，终止对多边贸易的前程发挥建设性作用。许多美国人指责东亚国家，特别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实行不公平政策，与此同时美国自

身则有所选择地高筑贸易壁垒。比如说，“超级 301 条款”和“常规 301 条款”，均是作为强制性双边约定手段出台的，与关贸总协定相悖。此外，欧共体在其农业政策方面固执己见，对乌拉圭回合谈判变得步履维艰负有主要责任。尾随美国的后尘，欧共体亦大搞自动出口限制和反倾销程序，有选择地、武断地抵制具有竞争性的产品进口。

自由贸易的老牌拥护者竞相试穿新衣，后来居上的新秀们尚且衣不遮体，一时间出现时新服装设计商店短缺现象。在双边或地区间施展纵横捭阖的战术才能，对决定各国贸易条件和前途命运则贻害无穷。既然美国在世界经济中作用削弱，当今的主要问题是欧洲和东亚何去何从。更确切地说，这两大地区之间将如何相待？

在 60 年代，塞尔旺-施赖伯 (Servan-Schreiber) 曾告诫人们美国控制欧洲工业的危险性。而今东亚突飞猛进，尤其是日本，引起类似的关注。趁欧共体专注于自身结构调整之机，东亚各国的企业已成功地将其势力扩展到世界这一部分。出于种种原因，许多欧洲人把他们的竞争看作是危害。一些人强烈反对日本攫取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高科技部门。另一些人则担心亚洲“四小”或东南亚国家联盟将包揽中级技术的天下。与此同时，欧洲企业则通常不愿去努力开拓东亚地区市场。

欧共体对外政策尚未最后确定。构建共同体总体的部分准则和力量也是如此。对自发的市场力量纵容到何种程度？要不要采取积极的产业政策？如果需要，应采取何种政策？在这些问题上举棋不定恰与欧洲该如何应付东亚挑战的问题有关。

自亚当·斯密 (Adam Smith) 发端的西方经济思想，其基础是，市场力量是人类欲望和抱负作用的结果。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提倡政府在流通陷于停滞时扮演调节人的角色，为走出 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危机提供了出路。“微

调”的消极作用，加之政策制定者常常假公济私，对社会福利漠不关心，最终引发对任意制定经济政策的谴责。海克（Hayek）大力主张把自由即个人享有不受任何约束的选择自由作为社会的首要目标。计划经济的崩溃已经为这种观念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

实际情况是，放任自流的市场力量辅之以最低限度的公众参与的模式，正在出现紊乱。然而，那些尝试建立混合政体，通过加强干预力度和严格限制转移支付条件，以引导私有制市场的西方经济模式，同样正面临着严重的问题。这些经济模式大多数不仅宏观经济条件差，而且工业生产薄弱，但公共部门则呈不断增加势头。反观东亚地区，没有哪一国的经济增长是在不受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实现的。在日本，强有力的通产省无疑是日本经济的规划者和经济奇迹的催化剂。在韩国，贸工部在扩大工业品出口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所有私有行业普遍获得经济增长，企业网络迅速将技术和发明转化为深受青睐的产品。这种流行的结构致使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观点再度流行，他曾阐明能动发展的重要性及智力创造背后的机制。另外，在东亚国家越来越重视对人类资源的开发利用。

撇开国际经济竞争和商贸条件，还有其他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人们广泛参与。贫困的阴影继续笼罩着人类，且在未来年代有失控的危险。第三世界国家大多数人口生活条件的改善微乎其微，甚至进一步恶化，无望降低其出生率或控制人口增长。地球上人类的日益增长对自然资源施加着沉重的压力，尤其是在那些市场发育不健全、技术进步迟缓、不能有效利用资源的国家最为突出。

我们生存的基础——具有生命保障功能的世界植被、大气层和水源——一部分地构成了世界各国的共有“资源”的组成部分。市场参与者不可能将之据为己有，但近乎间接地利用却可从中获利，同时借之处理废弃物和污染物即不用花钱又十分便捷。然而长此以往，问题堆积如山。我们不断扩张的经济活动对世界环境的影

响持续螺旋式上升，不仅将剥夺后代人价值选择的权利，而且其生活质量势必低于现今人们享受的水准。

许多个人、企业和国家正在采取措施应付这种局面。但在行动步调和使用的手段上各有侧重。一些人看准“绿色”技术蕴含着商业机会，另一些人则认为商贸本身就是威胁。环保运动普遍赞同对商贸活动设限，视其为造成损害的根源。毋庸置疑，在许多情况下商贸会损害环境，然而贸易壁垒又将减少国民收入，引起国与国之间的摩擦。

综上所述，世界经济的各项主要因素均在发生变化。国际议事日程上已经更换了优先考虑的问题。我们正进入一个全新的挑战时代，机遇与风险并存。充分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尽量减少军事占领，更多地谋求和平共处，已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共识。与此同时，世界既群龙无首，又缺乏规范。美国已经丧失先前的支配地位，欧洲正忙于结构调整，东亚地区发起一轮经济挑战，凭借训练有素和埋头苦干的人力资源，其制造业出口扩张之势咄咄逼人。西方经济正陷入巨额贸易逆差的困境。日本已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来源。在多边贸易体系岌岌可危的同时，区域自由化正取得实质性进展。政策制定者们在经济问题上不知道怎样扮演什么角色才合适。最后，还有些课题需要世界共同体采取行动，诸如第三世界人口爆炸问题，全球环境破坏问题等。

西方应做出何种反应，怎样做出反应？哪些因素对未来民族和个人的交往具有指导作用？本书试图通过突出强调欧洲与东亚的关系这一焦点，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只要将贸易和投资情况简单地做一比较，这两大地区之间尚未充分发展的潜在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把这个“缺掉的链环”连接起来将对国际经济关系的走向从总体上施加决定性影响。

本书结构如下，第二章纵观近几十年国际贸易情况，仔细考察自大西洋向太平洋的经济重心转换。揭示东亚地区积极扶植出

口政策的作用。本章最后探讨东亚地区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的主要影响。

第三章阐述对外投资和国家特色，重点是日本和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本章首先揭示直接投资的性质，及其对国家经济的相互作用。概括地描述日本社会和产业组织独具的特征，着重说明其重视人际关系作用的特色，这一点已或多或少扩散到整个东亚地区。后三节回顾东亚地区内部发生的经营国际化，日本对西方的直接投资，以及外国对日本的直接投资。

第四章论述东亚地区异军突起对国际贸易政策的影响。关于保护主义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美国 (supergains) 角色转换的问题上，分析为打开日本市场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在详尽阐述“超额收益”之后进而研讨贸易自由化的国际动向，其中包括区域一体化。最后，对“非控制贸易”施加于非商业环境效益的影响加以分析。

第五章研讨世界贸易和投资三角关系的第三条边，即欧洲与东亚地区之间远未得到发展的交流，重点放在欧洲一体化进程，及其对欧洲与东亚各国关系可能产生的作用和反作用。进一步分析日本在欧洲直接投资的作用，以及普遍错失的交流机遇，尤其是欧洲人在东亚地区的情况。

第六章研讨各项政策的内涵。第一部分综述国际环境，第二部分则以制定欧洲对东亚地区政策的必要性为重点。